

# 包慧怡:写作与授课都是一种邀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在个人简介中写上“斜杠青年”——拥有多重身份或者定义的青年，而包慧怡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在复旦大学英文系任教的她是一名译者，译有《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爱丽尔》等。作为一名写作者，她写诗，出版了诗集《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也写评论以及随笔，新书《缮写室》就是一本欧洲中世纪文学的阅读评论。包慧怡凭此书获得了今年首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

对包慧怡而言，授课与写作都是一种邀请，“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传递的，希望通过我的文本可以去邀请更多人，让他们可以找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写作是对生命的完成，你既是孤独的又不是不孤独的。作为一个被点亮的人继续把事情做下去，有这样一个意识时，写作无论如何是不孤独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珩/文 施向辉/摄

## 包慧怡

1985年生于上海，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英文系。出版诗集《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散文集《翡翠岛编年》；出版译著十二种，包括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普拉斯诗集《爱丽尔》、保罗·奥斯特的小说《隐者》等。

### 1

缮写室是欧洲中世纪制作书籍的地方，而《缮写室》可以说是一本包慧怡的个人“阅读空间”。书中所写的作家：莎士比亚、刘易斯·卡罗尔、王尔德、“珍珠”诗人、安吉拉·卡特等，都是包慧怡少年时代遭遇并喜爱的作家，是她个人阅读史上较为接近起点的那些路标。

在书的后记中，包慧怡写道：“自己最初想成为的写作者，是那种为世上某个角落里的陌生人完成一次‘点亮’的写作者。点亮是一种邀请，推门的动作却必须由陌生人亲自完成，为了此刻他或她内心深处的灵犀一现，为了让更多陌生人悄然加入这传递火光的亘古队列。我亦曾这样被点亮，并循这微小的火光来到此地。手捧这本小书的陌生人，愿你们能走得更远，直到地图之外的地方。”

作为如今的“点亮者”，包慧怡被阅读“点亮”的经历要追溯到童年。童年的她在外公家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也奠定了她日后对于西方古典文学的喜爱。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所有的第一志愿都是英语专业，因为喜爱阅读史诗的她，觉得世界上有那么迷人的地方，自己一定要去远方，而语言是打开远方的钥匙。

2008年，研究生期间在牛津大学交流时，包慧怡密集地读到“珍珠诗人”等中世纪作家的作品，一下子进入了那个世界，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个世界让你感觉太安心了。他们是真的用全部的灵魂在书写，然后他们祭出了血肉写的作品，也值得你用你的生命或者生命的一部分去认真对待。”

“当时在国内读书，这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资源实在太有限。”在陆谷孙教授和导师谈峥的鼓励下，她最后决定来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攻读中古英语文学博士。在爱尔兰求学的四年时光，是枯燥孤独也是投入的。除了写课程论文和收集文献之外，多数时间包慧怡手握一面放大镜，费劲地分辨手抄本上的拉丁文字迹，根据字体、符号以及牛皮纸的质地判断手稿的年



包慧怡接受读品周刊专访

份和产地，它是出自僧侣还是俗众之手，是修院或贵族私藏的珍宝还是民间流传的小册子，再将破损羊皮上的字母完整抄写下来，译成英文。这段时间的生活被包慧怡记录在2015年出版的《翡翠岛编年》中。

2015年，包慧怡决定回国，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生病，另一方面她认为，欧洲不缺一个来自中国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研究者，但她回来可以带来一些不同。

### 2

在复旦读研期间，包慧怡开始海量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她觉得很安心。最初开始翻译的时候，包慧怡也翻译过一些并不太喜欢的作品，现在看来，她觉得可以算是一些黑历史。“我始终认为语言是一个很脆弱、容易被磨损的东西，那时就觉得有交稿期限的翻译对自己的中文有伤害，就开始制定原则，只能接真正喜欢、未来想成为的那类作家的作品来翻译。”

25岁左右，包慧怡开始基本只翻译诗歌。“翻译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语感和这本书的语感有一个角斗的过程，这对于你的语感而言是一种‘竞技场’。当所有这些结束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语感是扩大的。然后你可以用它再来反哺你的写作。这个过程我是受益良多的。”

包慧怡的译作包括保罗·奥斯特的小说《隐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散文诗集《好骨头》等。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她对伊丽莎白·毕肖普和另一位美国重要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翻译。她2015年出版的译作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与普拉斯诗集《爱丽尔》，频频出现在当年的各大好书榜单中。或许，只有同样作为诗人的包慧怡才能和她们的灵魂与作品如此接近，并将她们与读者勾连。

对于包慧怡而言，研究、写作和翻译是三位一体的，是认识世界的三个不同侧面。“非要区分的话，可能研究是一个‘从外到内’的过程，写作是‘从内到外’的过程，翻译是介于两者之间，先是将外部内化成自己的，最后再呈现出去。不管是做

哪件事情，思维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研究和写诗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脑回路。”

### 3

包慧怡的诗歌创作开始得很早，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很喜欢阅读泰戈尔以及印度史诗。“我觉得史诗很有意思，是叙事讲故事，语言又那么美，这比单纯讲故事让我觉得更爽。所以那时候就会去写，当然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但好处可能是仅仅去聆听诗歌就可以让世界安静下来，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这对于性格内向的小孩来说是个救命的事。”

在个人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包慧怡的诗歌创作理念也发生了改变。早期她写诗，是希望发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认为原创性、天才、经验是最重要的。“后来读多了中世纪作家的作品，发现他们是如此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位置。就像爱尔兰神学家爱留根纳说的那样：‘世界是上帝的手指写成的一本大书。’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这本书添加的一页，或者是在这一页的基础上发展成另一本书。其实你大部分写作障碍都产生于，你认为自己必须超越前人。随着写诗的推进，我开始将自己看作是手艺人。天才太多了，这个世界并不缺少你的那一份，你能做的，就是将写诗作为洁净自己、为生活提纯的方式，将这个东西保存下去，是比写出所谓天才之作更能带给我快乐的事。”

对诗人包慧怡而言，诗歌创作是她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写诗更多的是试图重新发现并整合世界，试图在问why。现在很多人只是‘看到’(see)了世界，但并没有‘看见’(perceive)——看见的拉丁文词根是‘彻底抓住，全盘把握’(per+capere)——看见并且把握，才是理解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构建我们自己的真相。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尽可能看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这恰恰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perceive的过程需要一生的努力。对任何形式的写作，我最看重的是，语言可以在个人对于存在的体认中打开怎样的新维度。”

## 对话

### 莎士比亚的坦诚和羞涩超越我们预期

读品：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本难免被比较，是否在意读者的评价？

包慧怡：我觉得这很正常，只有特别不自信的译者才会期望所有的读者都会喜欢或认同你的译本。实际上当一个译本或书出版以后，它就不再属于译者自己的，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和文本产生自己接受的态度。汉语可以容纳这样的自由，我觉得所有诚实的译者的劳作也是对这种自由和包容的诠释。

读品：诗歌为什么能够复活我们的语言？

包慧怡：读诗的时候你需要去分析每一个词语，这是最小的单位，为什么使用这个词，你可以感觉到，为什么同样是月亮，moon和luna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当你每个词语都能辨析，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文字的灵感会反哺你的生活经验。大家还是要分清自己到底是喜欢读诗还是喜欢读诗的景观，这个东西长期来说对诗歌是不公平的。当你读得多了，你会开始有那种语言的敏感度，光是读别人的诗肯定是满足不了你的，你肯定会想要自己去提笔写。在今天，我们都能看到语言是怎样急速的方式在被磨损和消耗。比如大家都在说“三观”，今天人们在谈论“三观正不正”的时候，到底在说谁的三观？一群人的三观吗？让每个词尽可能精准地在独一无二语境中表达独一无二的意思，这是诗人的天命。

读品：接下来有什么新作品吗？

包慧怡：新书是关于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的14行诗，之前就有很好的译本、评析、解读，但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写作方式，我觉得比较遗憾，因为我认为14行诗是最贴近莎士比亚的，他的剧本里都是戴着面具，以第一人称的抒情，写他自己的情感生活，里面有很多八卦的东西，但他写得非常直白。莎士比亚的坦诚和羞涩都是超越我们预期的一个作家，在英语学界，14行诗是仅次于哈姆雷特被引用的，因为大家都喜欢。

读品：欧洲中世纪文学在国内的关注度并不高。

包慧怡：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文本是拉丁语写的。那么转译的话肯定会有损失。另一方面存在地理和文化的断层。但我觉得这些都在改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了一套“中世纪经典文学译丛”，有转译大家产生兴趣，愿意去学习原文，这些都在慢慢变好。欧洲中世纪文学需要耐心才能进入，一旦进入就像迷宫一样，需要时间揭秘。进去之后每个转角都是一个暗门，会有一个更加幽深迷人的世界。进去之后就不可能回头的。

『点亮是一种邀请，推门的动作却必须由陌生人亲自完成，为了此刻他或她内心深处的灵犀一现，为了让更多陌生人悄然加入这传递火光的亘古队列。』